


口述史


徐杰舜 彭兆荣 徐新建 主编  
中国人文学家口述史文库

# 乔健口述史

李菲 访谈记录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

徐杰舜 彭兆荣 徐新建 主编

# 乔健口述史

李菲 访谈记录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健口述史 / 李菲编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9

(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

ISBN 978-7-222-12277-2

I. ①乔… II. ①李… III. ①乔健—传记 IV. ①  
K837.1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1661 号

出品人: 李 维 刘大伟

策 划: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高 专 马跃武

装帧设计: 王曦云

责任校对: 王 雪 张 彦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乔健口述史》

李菲 编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2277-2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 关于“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意义的对话

## (代序)

徐杰舜<sup>①</sup> 彭兆荣<sup>②</sup> 徐新建<sup>③</sup>

【编者按】2013年9月28日，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课题组成员在四川大学聚会，就“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出版和“总序”构想进行了专题对话。会议由徐新建教授主持。与会者追溯了口述史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口述史，尤其是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最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对话体“总序”初稿。出席专题对话的还有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李菲博士、人类学高级论坛行政助理韦小鹏以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十余名研究生。

徐新建（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今天早上原本是我们博士生二年级的一个田野调查课，特改为人类学论坛的特别专题，邀请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话题进行学术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大学院所，也不是学会，它是一种具有

---

① 徐杰舜，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研究方向：人类学。

②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文化遗产。

③ 徐新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多民族国家文化研究。

创新意义的学术方式。时至今日，它已经办了十三次。中间还有些特别会议。人类学高级论坛是一个民间性的学术共同体。论坛的主要发起人、会议召集人和秘书长就是徐杰舜教授。我就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大家欢迎！（鼓掌）

彭兆荣（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大家好！

徐新建：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我向大家隆重推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的徐杰舜教授。大家欢迎！（鼓掌）

徐杰舜老师原来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主编。这个学报创办了一个很好的人类学栏目，从它的封面到每期的访谈，再到人类学的主打栏目，都是很棒的。有二十几年了吧？

徐杰舜（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对！二十几年了。

徐新建：这个杂志大家要看一下，很不容易，现在被评为C刊，而且在人类学圈里的口碑很好。我现在简单说一下，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有一个项目。2011年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年会召开之后，人类学高级论坛启动了一个项目，叫中国人类学家的口述史。

整个口述史计划的成果是一套丛书，就是以海峡两岸人类学家的口述史推出系列性的出版物。为了这套丛书的顺利推出，需要做一个总序。今天三人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完成这个总序的构架、内容、意义。这表面上看起来即兴的对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2013年6月在台湾期间，我又与乔健先生、王明珂老师等做了深入的交流。

此外，还有两位老师要介绍给大家。一位是李菲老师，她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的副主席之一，她也是口述史计划第一阶段的主要访谈者和撰写人。她主要采访了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在台湾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访，前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整理和撰写。还有一位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助理韦小鹏。

我的铺垫大概就这么多。接下来，先由徐老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然后彭老师来阐述项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 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由来

徐杰舜：徐新建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这个专项项目——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为什么要做这个口述史文库？我觉得，还是要从我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经历说起。

我在办这份刊物的过程中有两个感触：第一个是中国太需要人类学了。因为人类学是以人为本的。这已成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第二个是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太边缘了。这两个“太”字让我感触很深。人类学“边缘”到了这种程度——仅能在中国大学的学术体制中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在体制内，作为二级学科，很多资源你是拿不到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又很需要人类学的参与。比如农民工问题、城市问题、养老问题等等，都不是其他学科可以解决的。因为其他学科往往容易见物不见人，或者是很少见到人，而人类学总是坚持首先从人出发，一切要从人的生存、发展来考虑。人类学从人出发，最后还是回到人本身。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谁看得起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工刚出现的时候，这个群体是吃得最差、住得最差、做得最累、拿到的钱又是最少的，甚至还可能拿不到。但另一方面，城里人离开了农民工怎么过日子？春节，农民工回家了，北京城里报纸没人送，牛奶没人送，早点没人做。人类学家介入这个社会热点问题以后，就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说，中国太需要人类学，而中国人类学又太边缘了。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在我们学报专门开设了一个人类学专栏。因为人类学的文章很少有地方能发表，特别是人类学的田野报告更没有地方发表。

从1994年开始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以来，我特别要感谢乔健先生。乔先生在1995年退休时，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讲座教授。在荣聘仪式上

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sup>①</sup>。他把这篇演讲稿给了我们学报。我当即就决定安排在1995年的第一期刊发，但稿子才到一审就出问题了。乔先生在文中谈到中国人类学有四个困境，其中一个就批评了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怎么办呢？为了这篇文章能顺利刊发，我就跟乔先生商量，问他能不能把这一段去掉？这样一来，四个困境就变成三个困境了。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但乔先生胸怀很宽大，同意了我们的审稿意见。当然，后来有人批评我说不该删掉，但是不删，文章就发不出来。结果，这篇文章一发出来，就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为那个时候学术批评类的文章是很少的，更没有人针对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做出批评。紧接着，北京的人类学者就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sup>②</sup>，专门针对乔先生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赞成乔先生的观点，似乎觉得乔先生担心得太多了。他们的这些不同意见，后来也在我们学报全文发表出来，这就引起了大家对中国人人类学的关注和讨论。1996年初，《中国民族》杂志发表了一篇述评，认为这场讨论是1995年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事件之一。正是由于乔先生文章的发表及其引发的讨论，使得学术界开始关注和重视中国人人类学。

在这个背景下，我办刊物的信心就更足了。因为我们的刊物已经成功地吸引住了一批人类学者。这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可不可以对中国的人类学家进行采访，做他们的口述史？可是，采访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吗？不出所料，我们的采访一开始就受到很大的挫败。谁都不愿意接受访谈。采访我？我有什么资格谈啊。你应该去采访费孝通先生。没人愿意谈，那怎么办？最后总算找到一个突破口——云南大学的黄泽，他是搞民俗学的。我跟他说，民俗学也算人类学，只要你愿意接受采访，就不成问题。于是黄泽便成为我们刊物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我们不但刊登了采访稿，还用黄泽老师很大的一张照片来做刊头。这也是学术刊物没有过的做法。这一下学术界就热起来了，此后学者访谈也就顺利做起来了。

---

<sup>①</sup> 此文为乔健先生于1994年10月28日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讲词，后刊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减。

<sup>②</sup> 详见《面向未来的中国人人类学和民族学——北京部分博士（博士候选人）关于本学科发展座谈纪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从1997年起，我就坚持采访国内的人类学者。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采访李亦园先生的事。李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特别重视，对我们的采访也特别支持。2000年，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对李先生做了一个专访，跟他畅谈了两个下午。李先生高屋建瓴，侃侃而谈，重点关注的是人类的未来。他认为，如果人类再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出现特化现象，那是很可怕的。到了2004年，在人类学高级论坛银川年会上，李亦园先生又发表了著名的《生态环境、文化理念和人类永续发展》<sup>①</sup>，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也一直关心我们刊物的发展。随着访谈的日益增多，后来论坛就结集出版了《人类学世纪坦言》和《人类学世纪真言》。这说明，人类学学者其实很愿意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来分享他们的治学经验与心得。

通过这么多年的访谈，我就有两个前面提到过的重要感受：一个是中国太需要人类学了，一个是人类学在中国太有用了。大家知道，中国的人类学学者很多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但他们在进入人类学之门后，就往往再也没有离开过。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这就是我们太需要保存人类学的历史资料了。因为人类学实在是太边缘了，没有一个单位会来保存这些学术资料。“文革”期间中国人类学遭受磨难，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砍掉了。我曾经看到过一份材料，其中讲费先生当年曾恳求高层留下人类学的种子，但没有成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的资料能保存下来的当然很少。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仍旧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虽然学科复苏了，但无法得到很快的发展。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恢复是在北京开的大会，轰轰烈烈的。而中国人类学复苏的标志性会议却只能在厦门大学开。为什么这个会不能到北京开呢？为什么不能挂靠在中国社科院，而挂在厦门大学呢？这里面都是有故事的。如果人类学的资料没能够得到很好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将来想要撰写中国人类学的历史，文献资料该到哪里去找啊！随着时间推移，人，老的老了，走的走了。所以2011年，当我们三

---

<sup>①</sup> 本文为2004·银川·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年会·主旨演讲论文，后刊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并于2004年11月25日被《文汇报》转载。



位在厦门大学会面的时候，彭教授就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做口述史，把这些老人类学家的材料都抢救下来，为中国人类学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当然，没有政府机构会来做这些事情，那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三个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当时李菲正好在厦门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我们三位的会谈她也在场。她立即接受了最迫切需要访谈的两位人类学家——李亦园和乔健两位老先生的访谈任务。李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理想了，李菲在台湾采访他的时候，每隔十分钟左右他就必须停下来休息。

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李菲负责第一阶段的访谈和撰稿。我的任务就是联系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我跑西走南，先后与三家出版社进行洽谈，几经周折，最后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谈妥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刘大伟社长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但需要我们出钱，而且还给作者一定的稿酬。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回顾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项目启动的过程，对刚过去的这个阶段做一个小结是很有必要的。在座的同学们都是见证人，见证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大概就介绍这么多了。

## 人类学家口述史的意义

彭兆荣：好的，那下面我接着徐老师的话继续讲。

学者的聚会，就是谈学术，所以也把同学们召集过来一起讨论学术工作。刚才徐新建教授把召集大家来这里的目的讲清楚了，徐杰舜教授也对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项目的背景做了说明。事实上，今天我们三人的工作，包括李菲和小鹏，主要的目的是要为这套丛书写个总序。这个总序是以我们三个人的对话形式来呈现的。这套书会一路做下去。现在的原则是60岁以上的知名人类学家都可以进入到“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所以昨天我们也在讨论，我们这一批人也要早做准备，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现在的情况是，不少七八十岁的人类学家记忆衰退，许多东西已经忘记

了。如果我们不早做准备，及时行动，将会导致这些珍贵财富的巨大浪费和流失。中国人类学本身就是断层的，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中断的。如果这些人类学家的口述史再不做起来，不仅中国人类学家的生命史无法记录下来，整个中国人类学历史也将是残缺的。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份珍贵的资料记录下来。但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因为有些老的人类学家已经过世了，像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当然，两位人类学家有人写过不同形式的“传记”；但有好些人类学家并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人就已经走了。以我的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工程不是一个完整的学科史，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史——人类学家自己的生命史来呈现，即以个体呈现整体。今天我们也像抢救遗产一样地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三个人不谋而合。当然，这也是人类学高级论坛的集体成果。

我想从学理上通过以下几点来谈口述传统、口语方式等的重要性。

### 一、口述之所以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对文字文明的反思

今天我们不管是梳理文字，还是梳理历史、梳理人类文明史等等，口述史一定是不可以少的，而且一定要在前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史观。例如，甲骨文实际上是口述留存于符号化的文字。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对甲骨文发生学意义的认识还不够，因为它把之前从口述转换到文字书写的流程给遮蔽了。口述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由于文字书写的传统上升到一个霸权的位置，即所谓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把其他的表达方式推到了“边缘”，逼成了“他者”，口述史则首当其冲。而这种割断历史，这种区隔我者与他者的表述方式，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反思。所以我们今天来做口述史，不仅仅只是做前文字史时代那一段，而是要在学理上反思以往过于文字符号权力化的表述方式，及其所代表的那段历史。事实上，不管在哪个时代，口述都是不可以丢的。丢掉口述就是数典忘祖，是文化史上的数典忘祖。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做人类学家的口述史，也是对口述这种表达方式的重新反思和认定。

## 二、中国的教育是从口述开始的，形成了中国式的“论语语体”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中国教育的鼻祖，《论语》是中国教育的模范。《论语》就是口头交流，就是口头表达，不写字，我称之为“论语语体”。孔子这么伟大的一个教育家，我们不相信他不会写字，不会写文章，我们也不会做这样的认定，但是孔子为什么不怎么留下文章呢？他留下的《论语》事实上是他的学生们记录下来的，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子曰”。这是一个对话体，就是老师说，学生听。左丘明在《左氏春秋》里讲得很明白：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传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什么叫“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这些都是口述的优势。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避讳，我们知道古代的文字狱，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很多都是“书见”。孔夫子显然非常明了口述和文字各自的优势。对于一个交流方式而言，不能因为你有了书写就不重视口述。我们今天的交流就是口述语体的。中国的教育就是始于口述，不是从文字开始的。因而人类学家口述史也可以是年轻学子吸取思想养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 三、“知”与“识”都可以理解为身体力行的实践和体现

就表述方式而言，人们习惯把口述史的“讲述”历史和文字史的“记录”相区别。有一种解释认为，文字记录只不过是将口述记忆以文本方式“物化”而已。无论如何，口述与文字都可以放在“经验”和“知识”范畴

来认识。知识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介说性知识（prepositional knowledge），即关于事物的知识。二是感觉和经验性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即事物本身的知识。三是技术性知识（skill knowledge），即如何具体做一件事情的知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分类“知识”，都脱离不了身体力行的“实践”和“经验”。换句话说，都与“身体”（实践活动）和“体现”（经验过程）有关。口述也好，口述传统也好，或者是“哼呀哈哟”的劳动也好，或者礼乐也好，都跟身体表达有关系。这就叫“具身”（即体现），英文的 embodiment，是对身体（body）的实践和实现过程，我们通常把这个词翻译成“体现”，即身体实现，现在翻译成“具身”，也就是具体的身体表达。

“具身”中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工具，即身体与介体的关系。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发声的时候，通常只是在一个小的范围讲话。如果范围大些，就需要提高音量，如果超出声音所及，我们今天会用麦克风。麦克风是人类因为口传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技术，而这个技术和你的口述相结合以后，中介（传媒）技术、工具的问题出现了，它使人与世界扩大空间的范围和维度，就像人们戴眼镜。我们原来看天能看多远？当有了一个天文望远镜的时候，你的眼睛和天的交流关系，因为有了这个技术的具身关系，所以身体有延伸扩大的能力。口述也一样，就像麦克风，因为有了这个声响系统就无限扩大。这与“音量”“声高”相似，在口述传统中加入了技术，使身体有能力增大。

#### 四、口述对于田野作业的“现场感”具有朴素和多样的特点

人类学在对“异文化”的了解中，口述与现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民族志资料的重要部分。文字没有“在场性”，缺乏“活态交流”。就表达和记录方式而言，口述和书写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包括“在场/缺席”。一般而言，口述行为既可以“在场”亦可以“缺席”，而书写几乎必定是缺席的。对于民族志调查来说，“现场感”的重要性无可置疑。“现场感”可以使其与故事本身一起成为讲述者：即故事对于叙事者来说是活生生的经验，民族志学者可以直接从现场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理解不同解释的背景和意义，并根据不同信息进行个性化的理解和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中

对所调查的“异文化”有着语言上的要求，即要求民族志学家熟悉当地的语言，除了不通过翻译直接与调查对象进行交流外，还可以从现场的口述中了解具体的事件和情境，甚至可以理解事件和情境之后的原因。同时，也使调查者与“现场”的距离尽可能地缩小。因此，口述在此便不只是一种认识对象、反映现实的方式，也是言说意义现场的重要因素。

田野调查所带人的“现场感”却给了口述史和口述传统研究一个重要的启示：口述不仅仅是一种叙述和传达的能力——声音的功能，它还时时刻刻建造一种变化着的关系结构。比如说，当一个地方首领在一个族群范围内通过一种方言讲述什么的时候，就在建造一种关系结构（人群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当人类学家在进行访谈的时候，也建立起了一种关系结构——地方民众（受访者）与人类学家（采访者）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结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口述的内容和品质。这些品质与文献记录大不相同。口述虽然存在着“言人言殊”的多版本情形，但也使得叙述变得丰富多彩。口述在表述上同时表现出其独特的品质，诸如表演性、圆滑性、现场性、交流性和感召力，为“雄辩”提供了一个形式依据，也构成人类知识和智慧的一个有机部分。西方的“逻辑”与“辩术”密不可分便是一个例证。

## 五、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是在扩展和延伸实验民族志基础上的本土化尝试

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常常通过口述材料来了解和记录生命史的研究，比如台湾“中研院”黄树民院士的《林村的故事》。人类学家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去了解林村书记的生命史，又通过村书记个体生命史从一个侧面反映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变革。这一“实验”获得成功。我们今天要做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多少也在扩展和延伸实验民族志的有关“生命史”的一些东西，同时，也将人类学家擅长的东西展示出来。大家都有一种感受，人类学家到老了，不能身体力行地进行田野作业，他们通常变得喜欢讲故事，讲来自田野中的故事。或许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通过怀旧式的故事方式回忆曾经的田野经历和经验；另一方面，田野故事原本是人类学这一学科全部学理价值的基础和基本。所以，人类学的学生也是听故事长大的。这倒是

有点“论语”的味道，这就是口述历史。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西方的“历史”——history，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文字书写的，这不对，history就是his和story的组合，就是他的故事。我们今天所做的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还仅仅是刚才我讲的抢救一个人类学家的生命史材料，同时也是通过一个人类学家的生命史，来反映近代以来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曲折的生命史。

## 六、在《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第一条就是口述传统

口述传统已经被提升到人类活态遗产的高度，成了全人类共同的遗产，需要全人类共同来珍传。1998年，联合国的非遗公约版本叫作《保护人类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传统是单列出来的。2003年版本的《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口述传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条款。也就是说，口述传统已经被当作人类非物质文化的无形资产，或者是活态遗产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做这个工作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承担着传承、保护、抢救、发扬中国人类学思想遗产，乃至人类共同遗产的使命。

我想到的就是以上这几点。

徐杰舜：好。刚刚彭教授讲得比较博大，把口述的历史讲得比较全面了。我再补充一下，中国人类学一直处在边缘地带，命运悲惨，发展之路崎岖坎坷。我们之所以要做中国人类学家的口述史，也就是刚刚彭教授讲到的，这是基于一个人类学者的使命感。费先生那一代人类学家走的走了，还在世的也将近一百岁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口述，尽管也有做过的，但大多数都来不及做，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担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努力把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做好，为中国人类学做好最基本的工作，为后代留下文化珍宝。

## 历史如何成为话语及其产生的社会意义

徐新建：我就接着大徐老师的话题继续讲。刚才大徐老师和彭老师分别从各自参与这个项目的背景、进入的角度和学术理论的展开做了阐述。我也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首先从项目本身来看，以及项目所涉及的一组关键词来扩展到项目之外，一个是我们这个学科与外部的关系，另一个就是从历史意义上来推演出一些相关性的话题。从“人类学家口述史”中可以找出一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史学。彭老师的梳理，我是很同意的。他从英文的 history 开始讲起。这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当 history 的讲述被记录下来以后，就成为人类在文字时代记录精神财富的一种类型。而这种类型一旦被确定以后，它的整体性就被忽略了，就从“故事”变成了“史学”。《诗经》是怎么来的？《诗经》就是民歌在早期被文人和国家整理成文字传播、引用的一种话语。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楚的。

那什么是史学呢？我比较关注的有这样几个关联，一个就是古今。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历史如何成为话语，这种话语对社会成员又有何意义？这是我们要总结的，这也是一个纵向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横向的，即历史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明体系当中，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其中又有哪些是可以做比较的？比如说，history 跟“历史”，或者跟“史学”这个汉语表达之间，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文字结构当中，甚至在政治结构当中，在朝廷的官僚体系当中，什么叫史官？史官的政治地位，像司马迁这样的人，为什么在政治结构当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职位？而史官的自我认知和帝王之间的关系，这又是汉语世界当中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历史”在汉语体系文明当中的作用远远不是 history 能够对照的。

古今中外的关系汇集在全球化时代，在人类学语境当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简单地成为司马迁的传人了。在司马迁《史记》传统的后面，包括《论语》传统的后面，已经有西方史学的进入，就是各种翻译成汉语的西方史学著作，包括从荷马到黑格尔，甚至包括今天福山（Francis Fukuyama）用英文撰写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我们的史学与英语世界的史学传统交集在一起。这需要以古今、中西的框架来反思史学。这些问题非常丰富和复杂，我们这个课题当然也不可能一一解决这些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口述史显然是整个框架其中的一个点，而这个点连着很多线，是整个时代史学问题其中的一个支点。这个支点是跟我们相关的，因而我认为有几个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继续讨论的。



第一个是口述史革命。口述史肯定是史学革命的产物。关于它的革命意义，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从近代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始，那个时代包括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这批思想家，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要颠覆夫子、圣人的历史，所以才有人民的历史，有大众的历史，有国家的历史。现在的国家跟那个时代的国家意义还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国家，就是朝廷，就是帝制。国家是一个政府，政府是由人民构成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新史学的这个“史”，包括国史，不是王朝史，不是大唐李氏王朝，不是大明朱氏王朝，也不是大清爱新觉罗王朝。帝王的血统史不构成一个国家的文明史。因此整个历史从晚清到近代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转型。当然，也有像陈独秀、顾颉刚这样很极端的学者，用口号来打倒过去的帝王史、圣人史、精英史，要重建人民的历史，等等。这条线是我们今天做口述史不可忽略，需要继承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西方的史学，也有几次重要的变革。在西方的史学进程里有几次重要的变革。一次是从宏大叙事到社会生活。所谓的宏大叙事，通常是指由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一批人建立的那种宏大的、整体的历史。这个历史是有历史本质的，有历史规律的，他们要寻求整个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规律，所以呈现为宏大叙事，在这里，“宏大”的意思也可理解为“根本的”“根基的”。这种宏大叙事在西方源起，影响了全世界。这些宏大历史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小镇、某一个学校、某一个图书馆被某些个体写作和生产出来，然而却传播到全球，形成一个被视为世界性的知识话语，成为在当时所认可的最合理的叙事方式，就是大历史。这个大历史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五个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促成这套历史叙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就是黑格尔。黑格尔对历史的认识就是依据一种“绝对理念”——相当于汉语所讲的“道”，道的下面和表面是“器”，一切世俗生活都是“器”，是“道”之体现和转化。这套历史长期主宰了世界各地的历史认知，从知识分子到政府乃至到普通民众，影响非常深远。

这个“大历史”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逐渐出现转型，它的挑战者或对立面就是“后现代”。于是慢慢地宏大叙事的大历史就只还原为历史诸叙事中的一种，而不再是唯一。转型后的知识结构里，出现了和大历史相并行的

“小历史”，也就是复数的历史、多元的历史以及社会生活史及个人命运史。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社会学讨论社会时“见社会，不见人”的反常现象。如今，社会生活史提出的“新史学”主张，就是要把历史还原到日常生活，还原到具体的、有血肉的个体生命、家庭、社区、街道、工厂、村庄之中。历史要呈现为普通人的日常状态。历史后面有没有规律？不好说。如果你找得到，就可以讲，但是不能随便做结论，因为你找到的规律，往往只是一种假说，能否被证实还不一定。以前的“大历史”偏向于拿规律到处去套，先出结论，再找材料，做的是“以论带史”，就是理论在前，历史在后。这样的叙事现在已经受到质疑了。

这样的背景催生了口述史的产生。所以我们做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第一个要点就在于是对史学革命的一种参与。当然这个史学革命再回到中国就非常有意思了。其实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和复杂。近代中国已经有过一次转型，就是从“五四”到新中国。新中国的历史是人民史、底层史。因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是要批判国家霸权和统治阶级叙事的，要推翻和颠覆过去那些被统治阶级所掌控的历史，改由被统治阶级来书写，所以有高玉宝，有小二黑，有白毛女。整个新中国的叙事理论是要由人民来书写的。

所以我们看到从1919年到1949年持续着一场漫长的史学革命，那就是帝王将相被打倒，工农兵群众登上历史舞台。遗憾的是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反弹却轻而易举，如今各地的历史叙事几乎出现大倒转，帝王将相复辟、国家叙事至上，而一度当了主人和英雄的人民群众却在春晚等节目里被丑化、被嘲讽……各种类型的王朝话语全面卷土重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后面的社会与学理基础值得深思。

现在，也正是在一个混杂的形态底下，我们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来做以个人为主体、以一个学术群落为边界的口述史，它的意义即已包含在里面，至于它预设的理论，我们还在摸索，现在还没有形成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基本理论。

第二个是人类学。人类学其实有两个走向。我们以前看的走向是作为对象的人类学、作为知识生产产品的人类学，就是它的民族志所指向的那个社会。